

抗战时期驻华美军部署及作战概况

——兼谈中国战区在美国战略棋盘上的地位

阮家新

内容提要 本文以珍珠港事件为分水岭,以美国官方史料为依据,论述了美国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态度由中立、暧昧向积极援助的转变;论述了美国在欧洲战场和亚洲太平洋战场的一般战略,尤其是美国对中国战区战略地位的估计及其在不同形势下的变化,以及美国直接向中国战区部署作战部队的情况。抗战期间,驻华美军最多时达10万人以上,其航空作战部队,弥补了中国空军的严重不足,增强了对日作战的空中打击力量和空中掩护力量;其空运部队的“驼峰运输”,创造了世界航运史上奇迹,对极端困难的中国抗战起到了输血的作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本文对抗战时期驻华美军的编成、番号、兵力、部署、作战、战果等,作了具体的介绍和评述;对美国军援的性质和作用,也作了客观的分析,以便人们对中国抗战的国际环境和国际军援,有更清晰更深入的了解。

关键词 抗日战争 驻华美军 中国战区

本文拟主要从军事角度,阐述美国决策者在不同阶段对中国抗战的态度,对中国战区战略价值的评估,以及直接部署美军参与中国战区(以及中缅印战区)作战等情况,俾能从一个侧面更详细地了解美国对整个太平洋战争的战略构想,了解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关系,更客观、更恰当地分析中国战场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也更深入地了解外部环境对我国抗战进程和结果的影响。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驻华美军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在西太平洋和亚洲的主要军事基地在菲律宾,驻有亚洲舰队、海军陆战队和一个步兵师。在关岛等地也部署有少量部队。

自 1844 年《望厦条约》后,美国就开始有军舰在中国沿海各开放口岸游弋(在此以前也偶尔有军舰在中国南部沿海港口停泊或登陆,但那是没有条约根据的),以后逐渐延伸到长江流域及其他地区,并形成常设驻军,其兵力大小,依情势而定。1937 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美国在华驻军如下:

长江巡逻舰队(Yangtze Patrol)——19 世纪后半叶美国军舰就在长江巡游,1919 年 12 月正式组成长江巡逻舰队,隶属于美国海军亚洲舰队,其编成内经常有几百吨至 3000 吨的炮舰、轻巡洋舰 10 多艘(舰艇数量时有增减),司令部设于上海(曾一度迁至汉口),在上海和汉口等地都建有专用码头。司令多为少将级海军军官,所辖舰艇以“保护美国侨民”和“保护美国利益”为由,在长江流域各要点如上海、镇江、南京、芜湖、九江、汉口、长沙、宜昌、万县、重庆等地巡游,经常应美国驻华大使或驻各地领事馆的请求,随时停泊或登陆,遂行任务。^①

华南巡逻舰队(South China Patrol)——与长江巡逻舰队同时成立,也隶属于美国海军亚洲舰队,其编成常有 5—10 艘左右炮舰,司令部设于香港或广州,司令为上校级海军军官,在珠江流域和华南沿海各要点如广州、梧州、汕头、厦门、福州等地遂行任务。

海军陆战队第二旅——辖第四和第六两个团及各种勤务部

① Kemp Tolly:《Yangtze Patrol—The U. S. Navy in China》,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71.

队,共约 5000 人,配属于美国海军亚洲舰队指挥,与英国驻沪部队协同执行保护上海公共租界和接应美国在华人员撤退的任务。其中第四团是 1927 年 3 月中国北伐军抵近上海时由美国本土调来的,第二旅旅部和第六团是 1937 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应亚洲舰队司令亚内尔(Admiral Harry E. Yarnell)的请求,由美国紧急调来,于 9 月初到达上海的。为防止战争可能波及公共租界,他们沿苏州河设置铁丝网,并构筑了 58 座街垒,严密防守。中日军队淞沪会战结束后,上海局势趋缓,第二旅旅部率第六团调走,第四团仍留驻上海。由于第四团长期驻扎上海,所以在美国军方或媒体上被称为“中国海军陆战队”(China Marines)。^①

步兵第十五团(15th Infantry)——团部率第二、第三营(第一营在菲律宾)及勤务分队共约 1000 人,自辛亥革命、清帝退位后中国陷于混乱的 1912 年起即驻扎于天津、唐山、秦皇岛等铁路沿线要点,保护美国在华北的权益,隶属于美国陆军第十二师(师部驻菲律宾)。1937 年 7、8 月间日军占领平、津后,驻华北美军的活动和供应日益困难,1938 年 3 月第十五团奉命撤回美国,其防务改由海军陆战队接任。^②

北京使馆卫队(Legation Guard)——是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之役以后建立的(列强各国都有使馆卫队),初期为一个步兵营约 500 人,后改由海军陆战队担任。1928 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美国大使馆后来也迁到南京,但在北平仍保留使馆卫队,1937 年卢沟桥事变后减为一个连约 150 人。

青岛和芝罘(烟台)前进基地(Forward Bases at Tsingtao and

① Mskin, J. Robert :《The U. S. Marine Corps Story》, New York McGraw Hill , 1977.

② Dennis L. Noble :《The Eagle and the Dragon》, Greenwood Press, 1990.

Chefoo) ——美国亚洲舰队于 1920 年前后建造, 青岛基地可供较大的舰艇如战列舰、重巡洋舰等停泊, 芝罘基地则供中小舰艇如驱逐舰等停泊。每年 5 月至 10 月菲律宾进入酷热季候时, 亚洲舰队便分批开往青岛和烟台, 一面避暑休假, 一面进行训练。到了冬季, 舰队再陆续南下, 开回马尼拉, 在青岛和烟台只留置少量人员, 看守军用设施。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 在华常驻美军总数约 4000—5000 人, 最多时可达万人, 以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为主, 除上述固定驻军地点外, 在台湾和东北等地也常有美国军舰巡游或短期驻泊。1941 年, 美日关系渐趋紧张, 长江巡逻舰队和华南巡逻舰队于 11 月间撤出中国, 编入驻菲律宾的亚洲舰队; 在上海驻扎了 14 年的海军陆战队第四团也奉命撤回国内。但驻北平的使馆卫队及驻天津、秦皇岛的海军陆战队队员共 212 人未来得及撤退, 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当天即被日军包围俘虏, 关进战俘营, 直到战争结束。

以上驻华美军都是不平等条约的产物, 是侵略性的, 与中国抗战无关。

亚内尔海军上将的大声疾呼

七七事变发生时, 美国亚洲舰队司令亚内尔正在青岛度假, 决定就近观察华北战事的发展。这时, 他接到情报, 说是上海方面有随时爆发战争的可能, 于是他决定立刻到美军在中国最重要的基地上海去。8 月 13 日, 正当日军向上海发动猖狂进攻时, 他的旗舰驶进了黄浦江。横行在吴淞口和黄浦江上的日本海军军舰, 看见这艘悬挂着上将旗帜的美国海军舰队司令的旗舰, 还颇有礼貌

地按照国际通行的海军外交礼节,向他致敬。^①

亚内尔在上海停泊坐镇,他认为这里是直接观察中日战争的最好“看台”,是对日本战略企图、军备情况,特别是对日本海军的装备、训练和作战能力作出评估的最好时机。1938年夏,他再次溯长江而上,到南京、芜湖等地巡视,观察日军向武汉的进攻。然后再回到上海黄浦江驻泊。他坚持认为,他作为美国在亚洲和太平洋第一线的高级指挥官,驻守上海不走,就是向日本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美国非常关注正在进行的战争,美国将坚决维护它在远东和中国的利益。直到1939年7月,哈特上将接替他担任亚洲舰队司令,他才离开上海。

在这期间,他向美国总统罗斯福和军界领导层提供了许多极有价值的第一手情报以及他的判断和建议。他肯定地指出:中国的命运、菲律宾的命运和美国在整个亚洲未来的利益,是联系在一起的;日本的对外扩张,必将危及美国在太平洋和远东的地位;日本终将成为美国未来的敌人。他警告说:“如果允许日本征服中国,那就等于放弃亚洲大陆以及对太平洋的控制权”;“只是由于中国抗战挡住了日本军团,它们才没有向加利福尼亚进军”;“如果我们不采取措施很快阻拦日本,白种人在亚洲就不会有前途了”。因此他提醒美国领导人必须对日本采取强硬政策,必须援助中国抗战,这不仅是为了道义上和政治上的缘故,也是为了美国的利益,从抵抗日本的扩张来说,中国是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的盟友,是美国在亚洲防御线上的堡垒。^②

亚内尔的意见在美国决策者中间引起了很大反响,在孤立主

① James L. Mooney:《Dictionary of American Naval Fighting Ships》, Naval History Division. Naval Dept. Washington, 1959 pp. 471- 479.

② [美]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2- 23页。

义占上风的当时虽未被及时采纳,但对美国后来政策的转变,起了推动的作用。

美国终于被卷入战争

1939 年 9 月,爆发了欧洲大战,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希特勒德国席卷大半个欧洲,法国被打败,英国也岌岌可危。在亚太地区,日本制造的汪精卫傀儡政权于 1940 年 3 月在南京登台,把国际公认的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国民政府称为抗日的地方政权而必欲消灭之,表明了日本要独占中国的野心。同年 9 月,德、日、意三国进一步结成法西斯军事同盟,构成对世界安全的普遍威胁。10 月,日军进占法属印度支那北部,进一步暴露出它要向东南亚扩张,建立太平洋霸权的野心。而这时英、法、荷等国在希特勒法西斯进攻下,自身难保,根本无力在亚洲与日本对抗,英国屈服于日本的压力,甚至关闭了滇缅路(封闭三个月),完全切断了中国海外交通,“东方慕尼黑”处于最危险的时候。

事态的发展,终于使美国决策者们感觉到法西斯势力急剧膨胀的普遍威胁,感觉到同日本的对抗已迫在眉睫,以自我孤立或中立来求得苟安的想法只是一种幻想,绥靖妥协满足不了日本的胃口,反而助长其气焰;必须转变国策,支持中国抗战,才能挽救亚洲太平洋的危机,除此已无任何妥协余地。因而他们在关注欧洲战争的同时,也加强了在亚洲和太平洋的战争准备,停止与日本战略物资交易,对日政策逐渐趋于强硬。

1940 年 11 月,罗斯福第三次当选为美国总统。12 月 29 日,他以惯用的炉边谈话的方式,严厉抨击了孤立主义。他说:“过去两年的经验已经无可怀疑地证明,任何国家都不能姑息纳粹,任何人都不能靠抚摩把老虎驯服成小猫……我们现在或者竭尽全力援

助那些抗击轴心国进攻的国家,或者看着他们失败,屈从于轴心国的胜利,然后等着自己挨打。”“我们不能用把头蒙起来的办法逃避危险,如果大不列颠一旦崩溃,我们整个美洲所有的人即将生活在枪口之下……”他号召美国人民要以打仗一样的紧迫感,生产军火,支援正在抗击法西斯侵略的国家,使美国成为“民主国家的伟大兵工厂”。^①

1941年1月,罗斯福向国会提出《租借法案》,3月获得国会通过。根据这一法案,只要“总统认为任何国家的防务对美国非常重要”,总统就可以直接和迅速决定资助该国购买和补充军事装备,不必经过国务院和国会的申报批准程序。这是美国最终摆脱孤立主义和中立法的约束而加入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关键一步。罗斯福根据《租借法案》,向英国提供了大量军事援助;同时又向中国增加1亿美元贷款,批准成立秘密的援华志愿航空队,加强中国抗战的力量。

1941年4月,苏日中立条约签订,日本的南进企图昭然若揭,美日之间开始了一场硬对硬的谈判。日本代表、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要求美国取消禁运,恢复石油、钢铁贸易,停止援助中国等等;美国代表、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一一驳回日本的所有要求,毫不退让。6月,希特勒德国对苏联发动“闪电战”,法西斯轴心国黠武扩张的野心及其对全人类的威胁有增无已。7月间,美国冻结了日本在美资产,强化了对日贸易制裁;日本则以侵占印度支那南部,作出进一步向东南亚和太平洋进军的姿态,以回应美国。11月26日,赫尔提出了被日本看作是最後通牒的要求,其中包括日本必须从1931年以来用武力强占的一切中国领土和印度支那领土上撤退,保证不再实行军事扩张,并废除同德、意签订的三国同

① 李言主编:《二战三巨头》,中国长安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535-536页。

盟条约等。^① 谈判实际上已成死局, 但日方有意拖延, 并以谈判为烟幕, 做好了向美国、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进攻的准备。

1941 年 12 月 8 日, 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 太平洋战争爆发, 美国终于被卷入战争, 站在了反法西斯的同盟国一边。中国抗战从此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融为一体。

美国对中国战场战略价值的评估

美国于 1941 年 12 月 8 日和 11 日分别向日本、德国和意大利宣战, 它要在欧洲和亚洲太平洋两大战略方向上同时作战。让我们首先了解一下美国的通盘战略, 以及美国对中国战场战略价值的估计, 因为这是美国决定对华军事援助规模和援助方式的基本依据。

(一) 还在 1941 年 8 月, 即珍珠港事件前约 4 个月, 罗斯福和丘吉尔就乘坐军舰, 在靠近英国的纽芬兰海面上举行秘密会谈, 会后发表了著名的“大西洋宪章”, 确定了两国在战争期间和战后的基本方针。珍珠港事件发生后, 丘吉尔立即前往美国, 于 12 月下旬和罗斯福在华盛顿举行了代号为“阿卡迪亚”的会议(Arcadia Conference), 商讨战略方针和联合作战的问题, 一致认为欧洲是盟国的根本利益所在, 欧、亚两大战场相比, 欧洲的情况更危急, 希特勒的威胁更大, 因而必须首先集中主要力量于欧洲战场, 以希特勒为主要打击对象, 而在太平洋和亚洲大陆暂取守势, 阻挡日本的进攻, 待打败希特勒以后, 再以主要力量对日作战。简单地说, 就是“先欧后亚”, 这就是美英双方协商确定的基本战略方针, 也是美国之所以实行“欧洲第一”政策(Europe First Policy)的依据。^② 苏

① [美]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 第 62-65 页。

② 章正余等编著:《罗斯福》, 京华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 726-728 页。

联这时也正在和希特勒苦战,当然也赞成这样的战略方针。根据这一方针,美国的兵力部署、对外援助对象和援助规模,都要把欧洲摆在第一位,其次才是亚洲。而在亚洲太平洋战场上,美国本身作战的需要又是第一位的,中国只能摆在第二位的位置上。这就是欧亚两大战场在美国全般战略棋盘上轻重缓急的大致顺序。

(二) 中国作为美国在亚洲的主要盟友,作为太平洋战场的重要一翼,在美国的战略计划中自然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其目的就是希望通过对中国的援助,加强与中国的全面合作,加强中国的抗战力量,使中国坚持抗战,更有力地消耗和打击日本,尽可能多地牵制日本军力,使日本不可能转用更多兵力于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上,必要时中国军队还可以向东南亚出击,配合盟军作战。

(三)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美国是颇为重视中国战场的。中国此前已单独对日作战4年半之久,迟滞了日本的南下,为美、英等国赢得了充分的战争准备时间;中国战场吸引了日本2/3以上的陆军兵力和相当大的海军兵力,使日本战争狂人深陷泥潭,消耗并削弱了日本的力量,使其不可能以更多的兵力投向太平洋战场,大大减轻了美、英等盟国的压力,而且可以使美英等盟国首先集中主要力量于欧洲作战,有利于“欧洲第一”方针的实施;中国的雄厚人力资源蕴涵着巨大的作战潜力,可以支持长期战争;中国的地理位置是预想中的对日本实施战略轰炸、战略反攻和战略进攻的最好基地之一。此外,还有一点也是罗斯福总统非常看重的,那就是通过援助中国抗战,还可以使中国成为战后美国在亚洲的最重要、最可靠的盟友,大大增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地位,有利于美国的全球战略和长远利益。

正是出于这些考虑,所以罗斯福总统以政治家和战略家的思考,力主加强对中国的援助,并不顾英国首相丘吉尔的反对,坚持认为中国在战时和战后都应该享有大国地位。为此,他采取了一

系列重要措施。

1942 年 1 月 1 日,根据他的倡议和他亲自确定的排序,由美、英、苏、中四国领衔签署了联合国宣言(最初在宣言上签署的国家有 26 个,后来增加到约 50 个)。加盟各国一致承诺应尽其兵力与资源,以打击德、日、意等法西斯轴心国共同敌人,且不得与任何敌人单独媾和。中国作为领衔签署的四大国之一,无疑大大提高了国际地位。

1 月 3 日,也是根据罗斯福总统的建议,设立了包括越南、泰国在内的盟军中国战区,由蒋介石出任最高统帅。后来战争的实际进程,盟军并没有在越南、泰国境内部署军队,因而中国也没有实施在这两个国家的作战指挥权,但中国派出约 20 万大军参加了缅甸境内的主要地面作战,成为盟军中缅印战区的主力军,使中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融为一体,开始发挥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有关国际事务中的积极作用和大国作用。

2 月 7 日,罗斯福总统致电蒋介石,称赞“中国军队……所进行的英勇抵抗已经赢得美国和一切热爱自由民族的最高赞誉。中国人民……对于在装备上占极大优势的敌人进行了差不多五年坚决抗击所表现出的顽强,乃是对其他联合国军队和全体人民的鼓舞。”^①同时选派被称为“中国通”的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将军担任驻华美军司令官、中国战区参谋长、援华物资监督执行官、美军中缅印战区司令官,协调和加强各方的联系。

3 月,中美双方签订了美国给予中国 5 亿美元贷款的协定,按《租借法案》向中国提供军事物资。这是中国在抗战期间获得的最大一笔美国贷款。

7 月,美国援华志愿航空队(American Volunteer Group)改组

① 关在汉编译:《罗斯福选集》,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345 页。

为美军中国特遣航空队(China Air Task Force),纳入美军正式编制,不久又扩编为第十四航空队,不断加强在华军事部署。

所有这些,都反映出太平洋战争初期美国对中国战场战略地位的高度评价和积极预期。

(四)在实践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发展,美国对中国战场的评估和预期,也出现了某些变化。

首先,美国官员深深感到,中国内部政治复杂,国民党的独裁、自私,引起各方严重不满;各党派之间的历史积怨很深,难以弥合;国共两党面临日本的侵略,结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相互之间依然存在着很多分歧和摩擦。不少美国在华官员,特别是史迪威,对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自私和腐败非常不满,纷纷向罗斯福总统、国务院和马歇尔反映;罗斯福也曾多次致电,或派人来华,要求蒋介石进行某些政治改革和军事改革,按照作战需要和部队的作战能力分配美援物资,史迪威甚至提出中共领导的部队也应列为分配对象,使美援物资能真正用于对日作战,但这些意见都触犯了蒋介石的大忌,引起美蒋之间(直接表现为蒋介石和史迪威之间)的矛盾。罗斯福本人虽也对蒋介石表示不满,但为保持中国政局的相对稳定,利于继续抗战,同时又使中国能在战后倾向美国,最终还是决定继续支持蒋介石政权。不过许多美国官员,首先是史迪威,对这种支持的效果,感到疑虑。

其次,国民党军队号称 380 万人,但组织庞杂,装备落后,缺乏训练,指挥不灵,效率低下,贪污腐败成风,因而大部分战斗力很差。1943 年,经部分改装和训练后,史迪威曾几次提出首先在缅甸北部进行反攻,打通滇缅公路和中印公路,以便有更多的援华物资运抵中国,加速军队的改装和准备新的反攻。但蒋介石认为中国军队还不具备反攻的条件,反而提出要美国增加 10 亿美元的贷款,提供 500 架作战飞机,增加飞越喜马拉雅山的空运物资数量,

在中国部署 13 个美国作战师等条件,美国也不答应。特别是 1944 年春至 1945 年春,日军发起 1 号作战(即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时,几十万国民党军被打得落花流水,连美军在华的重要空军基地桂林、柳州和在河南、湖北、湖南、江西等省靠近前线的野战机场都没有保住,相继被日军占领和破坏,连昆明、重庆这样的大后方城市都人心惶惶,整个国民党统治区笼罩在一片惊恐悲观之中。这种情况,与盟军在太平洋上的胜利反攻形成强烈反差。史迪威作为在中国和中缅印战区的美军最高指挥官,为扭转这种消极被动局面,要求改组中国军队,并授予他指挥中国军队的全权。罗斯福、马歇尔都对史迪威表示支持,罗斯福致电蒋介石,直截了当地要求蒋介石把指挥中国军队的权力赋予史迪威。这极大地刺激了蒋介石作为国家首脑和战区统帅的自尊,也使他担心会失去对军队的控制权,所以坚决不答应,反而提出要美国撤换史迪威。经过激烈的争论,最后,罗斯福无奈,只好接受蒋介石的要求,于 1944 年 10 月把史迪威召回美国,改派魏德迈(Albert C. Wedemeyer)中将来华,停止了关于指挥权的争论,但中国战场在美国决策者心目中的期望值,也降低了。

(五) 运输线太长,运输太困难,后勤补给不足,是始终制约着美国对华军事援助和军事部署的一大难题。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所有海港都被日军占领,海外援华物资只有借道缅甸海港仰光上岸,通过仓促修成的一条偏远崎岖的 1000 多公里的山间公路——滇缅路,艰难地运到昆明。就是这么一条公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也被日军切断。原来给予过中国较多援助的苏联,1941 年 4 月 13 日与日本签定了中立条约,6 月 22 日又遭到德国突然进攻,也停止了对中国的军援,连美国援华军事物资从苏联过境也不可能。英国自身难保,既不情愿也不可能援助中国,所以海外援华物资主要来自美国。而当时太平

洋上的航道已被日军切断,美国援华物资只能从美国东海岸启航,横渡大西洋,绕道非洲好望角,再横渡印度洋,进入孟加拉湾,到印度东部的滨海城市加尔各达、卡拉奇(今巴基斯坦)等地上岸,海上航程约 14000 海里(相当于 26000 公里),然后再用火车和汽车转运,行驶 1000 多公里,到印度东北边境的阿萨姆地区,再装上飞机,飞越气候极其恶劣、又没有导航设备的喜马拉雅山,把货物运到昆明。如此长途辗转,冒着敌人袭击的危险,迎着海洋的大风大浪,闯过世界之巅气流雨雪的变幻无常,可谓艰苦绝伦。最后这一段空运路线就是以困难和惊险而著称的“驼峰航线”(The Hump)。通过“驼峰航线”空运的货物开始每月只有 1000 吨左右,后来逐渐增加到 5000 吨、1 万吨至 2 万吨以上。从 1942 年夏到抗战结束,3 年期间通过“驼峰”运到中国的各种物资总共只有 65 万吨。每运 1 吨物资到中国,就要消耗掉 3 吨燃料,再加上人员、飞机和其他方面的损失,则代价更大。美军虽然一再增加运输飞机,但还是不能满足需要。由于运输困难,补给不足,美军不可能增加在中国的部署,已部署在中国的美军航空兵的作战行动也常常受到影响。美国向国民党军提供的第一批 30 个师美械装备的计划(美军战史上称为 Y 部队,主要是准备用于缅北滇西反攻的),和第二批 30 个师的计划(美军战史上称为 Z 部队,是准备用于向东南沿海反攻的),到抗战结束才完成 36 个师的装备。据统计,战争期间,美国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的援外物资总值 485 亿美元,英国所得占 63.71%,苏联占 22.76%,中国仅占 1.8% 不足 9 亿美元。^①这除了是因为美国当时执行“欧洲第一”的政策外,向中国运送物资的线路太长,代价太高,难度太大,也是重要原因。

①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战时外交》(2),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 1981 年版,第 307 页。

(六) 国际关系和大战形势的发展, 也使中国战场在美国战略棋盘上的轻重地位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太平洋战争初期, 美国蒙受很大损失, 英国在东南亚一败涂地, 两国还要首先关注欧洲, 苏联又与日本订有中立条约, 只有中国在顽强抗击日军, 牵制着日军大部兵力, 所以美国对中国战场寄予厚望, 认为中国坚持抗战对亚洲太平洋战场具有决定性意义。

1943 年春, 苏联在取得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后, 向德军发起战略反攻, 随后, 美国也在太平洋上对日展开反攻, 美英联军在地中海、北非和欧洲战场也取得了重大胜利。9 月, 意大利宣布投降, 法西斯轴心国崩溃了一角。10 月, 美、英、苏、中四大同盟国在莫斯科发表《普遍安全宣言》, 宣布四国将协同作战, “直至各轴心国在无条件投降的基础上放下武器时为止”。11 月, 美、英、苏、中四国首脑又分别召开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 商讨对德、对日作战和战后问题的处理方针。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上向罗斯福表示, 在打败德国以后, 苏联将参加对日作战。大战形势的向好发展, 特别是苏联准备对日作战的承诺, 使美国决策者在考虑今后对日作战时, 认为可以更多地寄希望于苏联, 而减轻中国的军事作用。^①

1944 年, 美国在太平洋上的越岛进攻节节胜利, 其空军已能从西太平洋上的马利亚纳群岛起飞轰炸日本本土, 比从中国成都附近起飞距离更近, 油耗更少, 因而逐渐撤出了部署在中国的远程战略轰炸机部队。

1945 年春夏, 美军相继攻占琉黄岛和冲绳岛, 可以以这些岛屿为跳板向日本作最后一击, 而不必以中国大陆和台湾为基地向日本本土发起战略进攻, 因而也取消了原来准备在中国东南沿海和台湾登陆的作战计划。

① [美]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 第 150-154 页。

可以说, 到大战末期, 中国在美国战略棋盘上的分量, 已主要转移到了战后世界格局问题上, 而不是对日作战问题了。

太平洋战争期间驻华美军部署及作战概况

如前所述,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美国增加了对中国的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 同时增加在中国的军事部署, 1944 年底至 1945 年初, 全部在华美国军事人员超过 10 万人, 主要是陆军航空兵部队、空运部队、地面保障和后勤保障部队, 此外还有各类军事顾问、军事教官等。

驻华美军司令部, 是驻华美军部队和各类军事人员的最高指挥机构, 全称为“中国战区美军司令部”, 史迪威时期又称为“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部”, 但并不是所有在华美国军事人员都由驻华美军司令部统一指挥(例如, 在中国的美军空运部队和 B-29 战略轰炸机部队就不归驻华美军司令部指挥)。驻华美军司令部的编成和职责在史迪威任职时期和魏德迈任职时期也有所不同。

史迪威来华时, 美国总统和陆军部赋予他好几个头衔: 驻华美军司令官、中国战区参谋长、对华租借物资监督执行官、美军中缅印战区司令官等。在他的司令部之下, 除执行相关职责的参谋、联络人员外, 还有派往中国各部队的 1200 多名顾问和派往桂林培训中心的 2200 多名教官。

1944 年 10 月史迪威被召回美国时, 罗斯福总统把中国战区和缅印战区分开, 任命魏德迈专任驻华美军司令官和中国战区参谋长, 不再过问缅印战场的事情, 也不再负责美国援华租借物资的监督执行, 因此魏德迈的职责只限于中国战区。他把司令部分为两个梯队: 前梯队(Forward echelon)在重庆, 负责情报、作战和计划, 后梯队(Rear echelon)在昆明, 负责军务、训练和后勤; 并在司

令部里设立了作战局(The Chinese Combat Command)和训练局(The Chinese Training Command),前者负责向中国团以上部队派遣作战顾问,后者负责建立炮兵、工兵、通讯、驾驶等学校或训练中心,对中国官兵进行技术培训。在以上机构工作的美国军事人员共约 5000 人。

美国志愿航空队(American Volunteers Group 简称为 A. V. G.),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为帮助中国抗战而组建的一支美国航空兵部队。因为那时美国还未对日宣战,根据中立法,不能派遣正式军队参战,罗斯福总统应中国方面的一再要求,于 1941 年 4 月 15 日签署了一项秘密法令,允许美国陆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现役飞行员、地勤人员退出现役,然后受雇于在中国的一家美国民营航空公司,到中国服务,同时按租借法案向中国提供 100 架作战飞机和设备。为便于运输和补给,志愿人员和所有装备、油料等都海运至缅甸首都仰光上岸。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他们才刚刚完成组建和短暂的训练。随后志愿航空队以昆明巫家坝机场为主要基地参与作战,队长陈纳德(Claire C. Chennault),下辖 3 个中队(squadron),100 多架作战飞机(P-40B 和 P-40E 战斗机),飞行员、机组人员和地勤人员共约 300 人,列入中国空军序列,佩带中国帽徽和“A. V. G.”领章。他们的第一仗就是 1941 年 12 月 20 日在昆明附近迎击由越南入侵的日军飞机,一举击落 10 架敌机中的 4 架。同年 12 月 25 日,他们截击轰炸仰光的敌机大型编队,击落其中 8 架战斗机和 15 架轰炸机。1942 年 5 月 12 日,他们偷袭河内机场,一次击毁停放在机场内的敌机 50 多架。据统计,志愿航空队从开始作战到 1942 年 7 月 4 日撤编的 7 个月里,在中国、越南和缅甸境内作战 102 次,共击毁敌机 299 架(一说 372 架),被

誉为“飞虎队”。击毁敌机和自身损失飞机的比例是 12:1。^①

第二十三战斗机大队(The 23rd Fighter Group) — 中国特遣航空队(The China Air Task Force)。美国对日宣战后,可以直接在中国战区部署军队,不必再使用“志愿队”的名义,因此,1942 年 3 月,美国决定撤销“志愿航空队”,组建第二十三战斗机大队,除将志愿航空队原有的第一、二、三中队依次改为第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战斗机中队外,又从印度抽调第十六战斗机中队,从北非抽调第四四九战斗机中队、第一一八侦察机中队等编入第二十三战斗机大队,并正式列入美军战斗序列,受总部设在印度的第十航空队指挥,执行中国战区的作战任务。在第二十三战斗机大队未编成之前,从 1942 年 7 月 5 日起使用美军“中国特遣航空队”(The China Air Task Force, 简称 C. A. T. F.) 的名义,指挥第七十四(昆明)、第七十五(衡阳)、第七十六中队(桂林),继续执行战斗任务。

美军第十四航空队(The 14th Air Force)。在第二十三战斗机大队组建过程中,中国方面一再要求美国增加在中国的航空兵力的部署,美军统帅部也认为,日军在中国战区掌握着制空权,对盟军作战十分不利,一个战斗机大队远不足于抗击日军的空中优势,因而决定从美国国内和其他战场继续向中国增派航空兵力,组建第十四航空队。1943 年 3 月 9 日,第十四航空队正式建立,以陈纳德为司令,开始时下辖第六十八、第六十九联队(Wing),后来又增设了第三一二联队和中美混合联队(The Chinese - American Composite Wing, 简称 C. A. C. W.)。每个联队辖 12 个战斗机大队(装备 P-38、P-40、P-51 战斗机)和 12 个轰炸机大队(装备 B-24、B25 中型轰炸机);每个大队由 35 个中队组成;此外,第十四

① Malcolm Roholt:《Flight in the China Air Space 1910- 1950》,Palmer Publications Inc. U. S. A.

航空队还直辖有重型轰炸机大队(The 308th Bomb Group, 装备 B-17 重型轰炸机)、侦察机大队、运输机大队, 还建立了气象、导航、枪械、通讯、后勤、医务等各种保障部队, 作战能力大大增强。这也是抗战时期驻华美军的主要作战部队。

第十四航空队司令部仍位于昆明, 各联队作战区域的划分大致是:

第六十八联队指挥部位于桂林, 其下属各大队、中队部署于柳州、郴县、道县、衡阳、邵阳、零陵、遂川、赣州、建瓯、长汀等机场, 负责华东、华南、台湾海峡、香港和印支北部的作战任务。

第六十九联队指挥部位于昆明, 其下属各大队、中队部署于昆明、楚雄、云南驿、陆良、保山、思茅、白市驿等机场, 负责中国西部、缅甸以及保护驼峰航线安全的作战任务。

中美混合联队指挥部位于芷江, 其下属各大队、中队部署于恩施、老河口、南郑、安康、咸阳、勉县、天水、宝鸡、阆中等机场, 负责长江以北地区的作战任务。

第三一二联队主要部署于四川、云南, 执行机动作战任务。

第三〇八轰炸机大队部署于桂林、陆良、广汉等机场, 负责对日军后方、东南沿海及印支北部重要目标的轰炸任务。

第十四航空队于 1943 年初建时, 共有各型战斗机、轰炸机 170 架, 1944 年 6 月增加到 498 架, 1945 年 6 月战争结束前, 增加到 723 架。由于后勤运输困难, 油料、军火、机件等补给不足, 经常影响第十四航空队的作战行动。虽然如此, 第十四航空队在切断日军交通运输线, 摧毁日军机场、兵站, 支援中国军队地面作战等方面, 还是发挥了很大作用。从 1943 年成立到 1945 年战争结束, 第十四航空队在空战中共击落敌机 1291 架, 重创敌机 655 架; 在轰炸中摧毁地面敌机 1057 架, 重创敌机 618 架; 炸毁敌人火车头 1079 个, 卡车 4800 多辆, 桥梁 580 座。第十四航空队本身在空战

中损失飞机 117 架, 地面损失飞机 76 架。^①

第五十八超级轰炸机联队(The 58th Bomb Wing, VH)。这是由 B-29 型远程轰炸机编成的联队, 由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和空军司令直接指挥, 对日本本土和重要军事目标实施战略轰炸。这种轰炸机机身长超过 30 米, 翼展 42 米, 发动机 2200 马力, 飞行高度 1 万米以上, 飞行距离 5000 多公里, 战斗全重 60 吨, 携带炸弹 10 吨, 作战半径约 2500 公里, 是当时世界上威力最大、技术最先进、飞行距离最远的轰炸机, 被称为“超级空中堡垒”(Superfortress)。

1943 年年中, 当 B-29 尚未装备部队时, 罗斯福总统就考虑要使用这种飞机对日本本土进行战略轰炸, 摧毁日本的战争能力。由于那时美国和其他盟国的空军基地都距日本很远, 超过 B-29 的作战半径, 中国虽距日本较近, 后勤供应又十分困难,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待美军攻下西太平洋上的马利亚纳群岛, 取得距日本最近的空军基地后再部署和使用这种飞机, 罗斯福认为那样势必会拖延时间, 决定不管多么困难, 也要尽快在中国部署, 这不仅对日本是极大的震慑, 对中国也是巨大的鼓舞。美国军方把这一决定称为“马特霍恩”(Matterhorn)行动。1943 年 11 月开罗会议时, 罗斯福总统把这一决定告诉了蒋介石。因为四川是比较安全的后方, 所以 B-29 基地就建在四川。中国方面动员了 45 万民工日夜赶修, 四个月内在成都附近的新津、邛崃、彭山、广汉, 修建了 4 个大型机场(有材料说还有一个大型机场在双流)。

1944 年初, 美国的第一支 B-29 轰炸机部队——第二十航空队第五十八超级轰炸机联队(辖第四十、第四四四、第四六二、第四六八大队)在美国堪萨斯州组建训练完毕, 然后横渡大西洋、印度

① Malcolm Roholt: 《Days of the Ching Pao》, Graphic Communications Publishing Div.

洋,在印度登陆组装,飞越喜马拉雅山,来到中国。四个大队装备的 B-29 超级空中堡垒经常保持在 70-80 架左右,最多时达 115 架。从 6 月 15 日起,“马特霍恩”行动开始,68 架 B-29 在夜暗中起飞,成大编队远征日本,把几百吨炸弹,倾泻在位于九州的日本钢铁基地——八幡工业区内,揭开了对日本实施持续的战略轰炸的序幕。在此后的六个月内,第五十八轰炸机联队共执行 49 次作战任务,出动飞机 3058 架次,轰炸了日本重要海军基地佐世保、长崎,以及在缅甸、泰国和中国东北、台湾境内的军事目标。1944 年 12 月,日军发动大规模 1 号作战时,第五十八联队出动 84 架 B-29,轰炸武汉、南京和长江中下游、东南沿海的日军交通运输线、兵站和军用仓库,投掷炸弹、燃烧弹 511 吨,使日军后勤补给受挫,迟滞了日军行动。

但由于通过“驼峰航线”运到中国的油料、炸弹和其他物资数量有限,即使优先供应第 58 联队,也难于满足需要。据说,以同等数量的运输机,飞越“驼峰”运送物资,来回 6 次,只够第五十八联队执行一次任务。而且,成都距日本太远,按 B-29 作战半径,只能到达日本南部的九州,而不能到达东京,这些都大大制约了第五十八联队的行动和对日本本土实施战略轰炸的效果。美国曾想在中国东部例如福建境内建一个 B-29 基地,毛泽东也曾通过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建议在华北修建一个 B-29 基地,但一则基地安全难以保证,再则后勤运输更加困难,所以都没有实现。1944 年底,美军攻占了西太平洋上的马利亚纳群岛以后,第五十八联队遂分批转场到马利亚纳,结束了在中国的“马特霍恩”行动。^①

空运司令部中印分部中国联队(the China Wing, Indian-China Division, Air Transport Command)。1942 年 3 月,日军占领仰

① William Green:《Famous Bomber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Doubleday, 1960.

光,切断了中国最后一条陆地国际通道——滇缅路,所有海港也都被封锁。为援助中国继续抗战,牵制、打击和消耗日军,发挥中国在整个反法西斯战争尤其是在太平洋战争中的战略作用,只有开辟空中通道,把各种军用物资运进中国。从1942年4月起,美军驻印度的第十航空队((Tenth Air Force)就承担起飞越喜马拉雅山向中国运送战略物资的任务。由于第十航空队运力有限,每月只能向中国运送100吨左右物资,杯水车薪,急需大量增加运力(飞机、驾驶员、机组和地勤人员等),并有一个专门机构来指挥如此庞大、复杂、持续、艰险的空行动,因此,1942年10月,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设立专门的空运司令部,下设中印分部中国联队,在中国和印度分别建立机场、仓库和各种设施,承担全部空运任务,由第十航空队和第十四航空队保障航线翼侧安全,防止日军飞机从缅甸起飞进行截击。“驼峰空运”通常是从印度阿萨姆地区到中国昆明,直线距离约1000公里;有时也直飞重庆或成都。

空运司令部成立后,运力和运输量迅速提高。1943年初其所属运输机约120架(多为C-46、C47型),运输量每月约4000吨;1944年初运输机增加到369架(增加C-54、C87、B24型),运输量每月达1.5万吨;到1945年战争结束前,运输机增加到722架,运输量每月达4万吨,其中7月份一个月运输量达到创记录的7.1万吨(平均每3分钟就有一架飞机起飞)。三年期间共向中国运送军用物资65万吨。机组人员和地勤人员也由初建时的2.6万人,增加到战争结束前的8.4万人,可见投入力量之大。许多飞行员每月飞行165小时(平均每天飞行5.5小时),有的飞行员飞越喜马拉雅山之颠超过一百个来回。由于气象、地形等自然条件极其恶劣,导航设备缺乏,坠机事件频发,以至喜马拉雅山谷曾有“铝谷”之称。飞行员即使跳伞也很少有生还的可能。据统计,3年间共损失飞机约500架,牺牲机组人员约1500人。

美国军事史学者在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时认为:“驼峰运输”这样大规模的空运,在美军战史和世界战争史上都是空前的,其结果基本保证了中国战场的稳定,牵制了大量日军,有效地配合了盟军在太平洋战场和欧洲战场的作战,因而构成了美国全盘战略上的重要一环,是具有战略意义的行动。^①

中印公路筑路部队。中印公路,是指以印度东部的利多(Ledo)为起点,修建一条公路,经过缅甸北部重镇密支那、八莫,继续向东,以中国昆明为终点,把印度、缅甸和中国连接起来的新的国际通道,全长 1700 多公里。这是史迪威提出的中国战区(也是中缅印战区)战略计划中的重要一环。他之所以坚持认为应尽早滇西缅北发动反攻,就是想通过这一区域修建一条公路,并沿公路铺设输油管,把大批援华物资从印度运进中国,打破日军封锁,改善中国战区的后勤补给状况,以挽救中国战区的危机。

史迪威的计划经美国陆军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随即从美国本土和其他战区向中缅印战区抽调工程部队。史迪威以雷厉风行而著称,1942 年 7 月,他就委派富有工程经验的惠勒少将(Raymond A. Wheeler)负责勘察和策划,12 月,最初的工程部队刚到不久,他就命令他们开始修筑印度一端的公路。1943 年 10 月,中国驻印军开始向缅北反攻,筑路部队紧跟在后,前面作战,后面筑路。在那样的密林沼泽,荆棘丛生,季风狂吹,暴雨倾盆,山洪猛泄,沟壑纵横,塌方多发,路桥频毁,蚊虫肆虐,瘴气熏人的恶劣条件下,再加上日军的抵抗和袭扰,筑路部队也不得不经常参加战斗。其艰苦情况,可想而知。

从 1942 年夏到 1945 年初的两年半时间里,美军陆续投入筑

① W. F. Craven & J. L. Cate:《The Army Air Forces in World War II》VII, Chapter 1
《The Air Transport Command》

路的部队有:

4个工兵团(the 45th, 330th, 352nd, 1327th Engineer General Service Regiment);

8个航空工程营(the 823rd, 849th, 858th, 1883rd, 1905th, 1880th, 1888th, 1875th Engineer Aviation Battalion);

两个战斗工兵营(the 209th, 236th Engineer Combat Battalion);

一个工程建设营(the 382nd Engineer Construction Battalion);

一个空降航空工程营(the 897th Airborne Engineer Aviation Battalion);

一个工程特勤营(the 1007 Special Service Battalion);

一个军需营(the 518th Quartermaster Battalion);

6个轻型舟桥连(the 76th, 77th, 71st, 75th, 191st, 504th Engineer Light Pontoon Company);

11个输油管道铺设工程连(the 699th, 706th, 709th, 775th, 776th, 778th, 779th, 780th, 1381st, 1382nd, 1756th Engineer Petroleum Distribution Company); 2个工程机械维修连(the 479th, 967th Engineer Maintenance Company); 2个枪械维修连(the 24th, 115th Ordnance Maintenance Company); 4个后勤运输连(the 3310th, 3465th, 4023th, 4024th Quartermaster Truck Company);

2个木材加工连(the 797th, 1388th Engineer Forestry Company);

一个重型机械连(the 497th Engineer Heavy Shop Company),
一个零部件供应连(the 1787th Engineer Parts Company)等等。

此外,美军第五三〇七混成部队(the 5307th Composite Unit)和一个战斗旅(辖步兵第四十七团、骑兵第一二四团)也与中国驻印军并肩参加了缅北反攻;美军第十航空队、第十四航空队、空运司令部提供了空中掩护和空投支援,这是美军在中缅印战场动用部队最多的一次作战,可见史迪威和美军统率部对缅北反攻和修

建中印战略公路的重视和决心。

中国第十独立工兵团、第十二独立工兵团也同时参与筑路。

1945 年 1 月 28 日, 进行缅北反攻的中国驻印军和进行滇西反攻的中国远征军在中缅边界胜利会师, 中印公路全线贯通, 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中国远征军司令官卫立煌等专程到云南边境小镇畹町, 欢迎美军中缅印战区前进指挥所司令皮克少将(Lewis A. Pick) 和满载物资的车队进入中国。不久, 由印度利多到昆明的输油管也全线开通。为表彰史迪威将军对修建这条战略公路的卓越贡献, 中国政府特将此路命名为“史迪威公路”。

此后, 美军第八五八等两个航空工程营以及第七十一舟桥连等部队留驻中国, 参与中国境内由昆明至边境约 700 公里路段的维护抢修, 保障道路通畅, 部分美军汽车运输部队也参与了运送军用物资, 直到战争结束。^①

除上述部队外, 还有一些非战斗人员, 如战略情报局特工人员、海军小组、驻延安军事观察组等, 人数很少, 不必详述。但美军驻延安观察组(不到 30 人) 是史迪威提出, 经罗斯福向蒋介石多次交涉, 蒋介石才同意派出的。这是美国军方向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派出的第一个官方机构, 也是美国军政官员与中共高层领导的第一次官方接触, 双方交换了许多信息, 美方还向八路军和新四军派出了战略情报和气象工作人员, 有其特殊的意义。

1945 年 9、10 月间, 奉美国总统杜鲁门之命在天津和青岛登陆的美军第三两栖作战军团(III Amphibious Corps), 辖海军陆战队第一、第六师和海军航空兵第十二、第二十四、第二十五、第三十二联队共 5.3 万人, 虽赋有解除日军武装、遣返投降日军和日本侨民

^① Anders, Leslie: 《The Ledo Road: General Joseph W. Stilwell's highway to China》,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65.

的任务,与处理抗战善后问题有关,但其来华时间已在日军投降之后,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战后格局,并直接和间接地介入了中国内战,所以不能列入抗战时期驻华美军之列。

几点评论:

中国抗日战争是以中国单独抗战为开始,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一翼而结束的。从美国在中国战区和中缅印战区的军事战略和作战行动,可以看出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密切联系。那么,美国的上述战略和行动,对中国抗战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应该怎样评价?我的看法是:

(一)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一直是独自作战,除苏联给予中国一定军事援助外,得到的国际援助很少,还经常受到“东方慕尼黑”的威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联结在一起,成了盟军太平洋战场的重要一翼,美国不但向中国积极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而且直接在中国部署军队,和中国并肩作战。这对处于抗战最艰难阶段的中国来说,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和心理上,都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事件。就作战来说,部署在中国战区的美军作战部队主要是航空兵,这正好弥补了中国空军的严重缺乏,正是中国战区最需要的空中打击力量和空中掩护力量。在此后的一些作战中,美军航空兵在轰炸日军后方,破坏日军交通运输线,配合中国军队地面作战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好的战果,在缅北滇西反攻、湘西战役中的作用尤为显著。至于通过大西洋、印度洋、喜马拉雅山(“驼峰”)而开辟的海、陆、空联合运输线,无论在长度、高度、难度、规模、惊险、代价等各方面,在世界战争史、航空史、海运史上都是创记录的。1942—1945 三年间,飞越“驼峰”运入中国的战略物资,虽然只有 65 万吨,但确是雪中送炭,维持了中

国战区的起码需要,起到了“输血”的作用。1000 多名美国健儿捐躯在“驼峰航线”上。这些对中国抗战的积极的友好的支援,都应给予肯定,中国人民将永远怀念牺牲在中国战场上的盟军战友。如果没有盟军的共同对日作战,中国抗战将要经历更长的时间、更多的磨难和更大的牺牲,由于有了盟军的共同对日作战,因而大大加速了中国抗战胜利的进程。

(二) 中国虽然是太平洋战场的重要一翼,但不是美国战略计划中的主战场,且因距离太远,交通阻隔,后勤补给特别困难,美国既不可能在中国部署更多的陆海军部队,也难于提供更大量的物资援助。因此,美国投入到中国战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而中国本身沿海和东部较发达地区,以及主要交通线,都被日军占领,依靠西北、西南经济薄弱的地区,能坚持抗战,已属不易,短期内不可能生成压倒日本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进而转入反攻。按照美国的战略构想,中国只要能坚持抗战,拖住日军,不使陷在中国的日军拔出腿来,调往太平洋其他地区,不给盟军增加更大的压力,就算达到了战略目的。所以,当盟军在欧洲和太平洋上展开汹涌澎湃的战略反攻和战略进攻时,中国战区总体上依然处于战略相持状态,直到最后也没有出现战略反攻。而这种相持状态,主要是依靠中国自己的力量支撑着的(包括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正因为中国承受着巨大的民族牺牲,发挥出坚韧的抗战意志和战争潜力,坚持持久抗战,所以始终牵制着上百万的日军(包括关东军),大大超过日本投向西南太平洋和东南亚的兵力,使日本战争狂人深陷泥潭,不能自拔,不能他调,满足了美国的战略要求;从两次缅北作战来说,中国陆军则担当了战役主力的任务,这就是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伟大战略作用和战略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讲,援助是互相的,盟国援助了中国,中国也援助了盟国。

(三) 美国援助中国的武器装备,本来是要加强中国的抗战力

量,结果全数被蒋介石独裁政府所垄断,成了加强他的独裁地位、推行排除异己、准备内战政策的资本,所以,这种援助也就带上了两重性,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正如当年有些美国官员如史迪威、谢伟思等所估计的那样:这些援助,在蒋介石手里,既可打外战,也可打内战;美国援助与一个走向没落的政权相联系,是始料不及的。

(四)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直是列强侵略、宰割、欺侮的对象,在国际事务中毫无发言权,毫无地位可言。经过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赢得了盟国的尊敬,赢得了大国地位,废除了不平等条约。太平洋战争爆发前,驻华美军(及其他列强驻军)是不平等条约的产物,是对中国的侵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驻华美军是中国的盟军,是帮助中国抗击侵略的,性质迥然不同。这些都是值得庆幸的和令人鼓舞的转变。

然而,美国虽力主承认中国的大国地位,其中却包含着想在战后控制中国、把中国纳入美国势力范围、成为美国附庸的企图。在与盟国的合作中,中国不但不能与美、英、苏平起平坐(例如美英组织的参谋长联合委员会,没有中国参加;许多与中国战区有关的重要问题,不邀请中国参与协商,而是在他们决定以后才通知中国),甚至处于被损害的地位(如雅尔塔会议等)。这是因为中国那时还是一个穷国、弱国,还没有取得真正的独立,与“大国地位”还很不相称。中国取得完全的独立,取得名副其实的大国地位,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但是,把抗日战争看作是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开端,是中国走向民族复兴的转折点,是符合抗日战争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地位的。

(作者阮家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博物馆研究员)

(责任编辑:刘兵)